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

2001

二〇〇一年 第三期
(总第一二九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江蓝生 秦 毅（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伟志	王缉思	刘树成
江蓝生	余永定	李 林
李铁映	李培林	李德顺
杨 义	杨天石	陈祖武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信春鹰	秦 毅	黄浩涛
梁慧星	蔡 昉	

总 编 辑：秦 毅

副总编辑：李 林 赵剑英

1752 B/10

1980年1月10日创刊

2001

中国社会科学

3

(双月刊)

总第一二九期 5月10日出版

-
- (1)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 · 4 ·
-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张一兵 · 4 ·
- 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 衣俊卿 · 11 ·
- 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
- 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 俞吾金 · 18 ·
- (2) 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 荣 剑 · 25 ·
-
- (3) 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
- 兼论归纳的实践必然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 陈 波 · 35 ·
-
- (4) 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 黄泰岩 王检贵 · 47 ·
- (5)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
- 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李 实 · 56 ·
- (6)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 胡鞍钢 李春波 · 70 ·
- 学术述评 ·
-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郑秉文 · 82 ·
-

(7)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周 弘 · 93 ·

·学术述评·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 尚晓援 · 113 ·

·学术综述·

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有益探索

——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综述 常宗虎 · 122 ·

(8)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 崔智友 · 129 ·

(9)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范 愉 · 141 ·

(10) 汉语奇偶句调型的组合模式 吴洁敏 朱宏达 · 154 ·

(11)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姜振昌 · 164 ·

(12) 《白门柳》：龚顾情缘
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张宏生 冯 乾 · 176 ·

(13)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
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1927—1937) 王奇生 · 187 ·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ABSTRACTS) · 204 ·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主任：江蓝生 秦 毅（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伟志	王缉思	刘树成
江蓝生	余永定	李 林
李铁映	李培林	李德顺
杨 义	杨天石	陈祖武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信春鹰	秦 毅	黄浩涛
梁慧星	蔡 昉	

总 编 辑：秦 毅

副总编辑：李 林 赵剑英

1152 13/10

1980年1月10日创刊

2001

中国社会科学

3

(双月刊)

总第一二九期 5月10日出版

-
- (1)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 · 4 ·
-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张一兵 · 4 ·
- 马克思思想：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 衣俊卿 · 11 ·
- 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
- 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 俞吾金 · 18 ·
- (2) 马克思的国家和社会理论 荣 剑 · 25 ·
-
- (3) 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
- 兼论归纳的实践必然性和归纳逻辑的重建 陈 波 · 35 ·
-
- (4) 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 黄泰岩 王检贵 · 47 ·
- (5)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
- 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李 实 · 56 ·
- (6)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 胡鞍钢 李春波 · 70 ·
- 学术述评 ·
-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回眸 郑秉文 · 82 ·
-

(7) 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周 弘 · 93 ·

·学术述评·

“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 尚晓援 · 113 ·

·学术综述·

重构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有益探索

——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综述 常宗虎 · 122 ·

(8)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 崔智友 · 129 ·

(9) 小额诉讼程序研究 范 愉 · 141 ·

(10) 汉语奇偶句调型的组合模式 吴洁敏 朱宏达 · 154 ·

(11) 《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 姜振昌 · 164 ·

(12) 《白门柳》：龚顾情缘
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张宏生 冯 乾 · 176 ·

(13)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
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 王奇生 · 187 ·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ABSTRACTS） · 204 ·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哲学堪称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的一个重要品格就是能自觉地把握时代的主题，不断实现理论创新。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中国研究者，要实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站在实践和时代的高度，从研究对象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发掘和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三位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发表他们的见解。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一兵教授提出的“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命题，旨在消除传统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的先入性强制，通过对第一手文献的真实解读，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相交融，从而为马克思哲学学术创新奠定全新的思考起点。黑龙江大学校长衣俊卿教授认为，马克思早期关于实践的哲学构想和关于异化的理论批判中所包含的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解，逐渐积淀并形成其思想的深层结构和本质内涵，也成为他全部学说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它作为一种关于人的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已内化到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人类的精神状况。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研究和西方哲学研究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中。西方哲学传统这一总体背景的缺乏，使得人们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自由概念所遭到的误解就是典型例子。事实上，只有先行理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康德关于实践和自由的观念，才能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实践和自由概念，从而科学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

“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张 一 兵

我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一书在1999年出版时，有些批评和误读是事先想到的，可后来出现的某种言说倒真是出乎意料。意料之中的东西，首先无非想到过理论前辈们可能愤怒地声讨我的轻狂：“回到马克思？人家都没有弄懂！？”其次，会是那些布尔乔亚自由主义者们的嘲笑声：“现在还在折腾马克思？”意料之外的是，一些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却从“回到马克思”中嗅出了历史的“霉腐”味道，然后，“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被升腾为一种口号，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旨趣来拒斥据说是面向过

去的“原教旨”情结。对于这一类反应，原来我倒真没有思想准备。不过，现在我愿意接受这一挑战性的解读，再次回到“回到马克思”这一话题上，以对话的姿态重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原初讨论域。我曾对这个学术目标做了如下的概括：“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①这一段话，如果加上“历史现象学”就涵盖了本文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言说“回到马克思”？

在某些学者那里，“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意向被狭义地修饰成一种“原教旨”意味，误导读者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似乎“回到马克思”不是要重建我们从未达及的全新（文本阐释）的历史视域，以使我们真正有可能重新建构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当代生成，而是唆使人们脱离现时代、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回到过去的书本，停留在对文本进行一般的考古学诠释上，把马克思哲学演变成一种“理论实体主义”的文牍运作。这真算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原由很简单，这是一种话语权的维护。如果传统解释框架中马克思的语境不是现成性的终结之物，它自然是可重新生成的（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以下简称MEGA2）的新文本，还是传统文本在当代理论视域中的全新解释效果），这就必然会使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铸成的体系哲学丧失权力话语的居上地位。所以，拒绝历史语境的开新是维护一种旧有的持存性，即马克思是现成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终结性），因此现在的事情只要宣布“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就行了。事情果真如此吗？

对“回到马克思”的拒绝潜藏了一种理论无根性的恐慌。由于过去我国的马列经典文献的翻译基本依赖前苏东马列编译局的前期工作，中国读者并没有经过自己对第一手文献所进行的认真深入的解读，形成我们自己独立的、符合原创性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达到的历史语境相交融。这种情况的出现，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方法论前提上的错误预设，即马克思是可以现成地“居有”的，似乎只要翻译一套全集，打开一部文本，马克思的思想便毫无遮蔽地在一个平面上全盘展开，剩下的只是根据我们现实的需要，任意地对其中的片段进行同质性（从第一卷的第一页，到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的抽取，拿它“联系实际”，拿它来与当代对话，拿它作为“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生成在这里荡然无存。人们甚至根本意识不到前苏东传统教科书解释框架对马克思文本先在的结构性编码作用。其实，所谓“回到马克思”不过是对此进行祛魅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解释学的常识中，任何“回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视域的整合。同样，“回到马克思”中的这种“返本”也不是出于“顽强的崇古意识”，“退回到马克思的原典上去”，而是要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本身就已经是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了。

事实上，马克思哲学必须走向当代从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这一意向生成现实何以可能。是回避马克思哲学在教条主义解读模式下形成的历史视域之必然消解，麻木地以其为前提口号化地制造一种马克思当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勇于重释旧经典，正视新文本，在一种新的历史视域中真正解决当代生活世界的新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争论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

^①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8页。

“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作为一种理论口号，这是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德里达在90年代相同口号的某种模写。但需要追问的是，实现马克思之思的当代性言说，究竟是在一种“在手”状态的外在层面上使马克思的思想与“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做简单的对话，还是准确地捕捉到马克思思想逻辑最重要的问题契合点，以造成一种新的“接着说”的学术创新关系？这也是我在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关键的异质性思考点。

我坚持认为，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是MEGA2）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即使强制性地生造出马克思与某种当代思潮的“对话”，这些“对话”实际上无不是在现成性教条体制统摄下的一种外在链接。

二、什么是文本学的解读模式？

我明确提出了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关注解读模式的重要性。在我们今天的学术讨论中，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被认真对待的方法论问题。学者们明明据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却以不同的理论尺度争论同一个问题。比如“人学”、“实践唯物主义”等专题问题，还有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等重要文本的重新阐释。人们在争论问题前谁都不去首先确定自己的理论前提，即是在什么意义上、何种解读模型中涉入一定的理论讨论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注意的学术规范问题。

依我的观点，“以不同的话语、不同的阅读方式面对相同的文本，其解读结果可能会是根本异质的。还原到我们这里的研究语境，即以不同的解读方式面对马克思的文本，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图景”。^①也因此，我明确区分了在理解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着的“五大解读模式”，即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和我国学者孙伯鍪教授的模式。孙教授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精心深入的解读而著称。除去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对我影响极大的就是他这种独特的文本研究法，也正是这种解读模式我称之为文本学的研究模式。对此，我再做一些说明。

这里所谓的文本学的对象域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专门标识文本学这样一个新概念，为的是要明确造成一种理论逻辑上的分界。虽然文本学也是研究经典著作，但其基本的认知模型和方法与传统的原著研究已经相去甚远。从狭义的文本学角度来看（广义的文本可以泛指一切可解读的对象），所谓“文本”，并非仅指特定论著中文字的总和，同时，文本的建构也背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任何文本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历史的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并且，由于作者本身的认知系统在创作文本的过程中是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这就必然决定了一个作者的文本本身不是一个静止同一的对象。文本自它诞生之日起，作者就已经“消隐”了（福科在同一意义上说“作者死了”），我们所能遭遇和对话的永远是历史性的文本而非作者本人（这一点对已故的文本作者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也在此列）。因此，文本所蕴涵的思想不是在其字里行间的显性逻辑中呈线性地自行展开，它需要阅读主体通过自身的解读来历史性地获得。于是，读者的“支援背景”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读过程。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诠释中不同视域历史性融合和作为解释结果的“历史阐释效果”，

^①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序言”，第2页。

都说明了这个意思。而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最根本的不同，是我注明的文本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

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传统研究中的主导话语和言说方式始终是非反思性的。以哲学文本为例，原著研究即用所谓教科书式的“哲学原理”非历史地反注马克思的文本和手稿，马克思原来文本写作中的历史性生成和针对不同对象的理论专题，被非历史地分割成“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这里发生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文本被非历史地“原理化”了，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荒谬的“按图索骥”。更有甚者，不同时期文本的异质性也一再被忽略，成了完全同质性的、可以任意援引的“语录堆砌体”。正是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误区，导致了我们的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研究长期低水平徘徊，理论创新缺乏活力。我认为，要改变这一状况，只有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由于文本的形成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或线性的思维直叙，也不是一个毫无异质性的自我“独白”，而是作者在与他同时代的人的思想交锋和碰撞中陆续形成的（大量的文本群就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文本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如果转换到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历史性解读上，就是坚决将体系哲学的前见（“原理”）悬设起来，将原来的文本阐释结果加上括号，以历史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的结构，让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理解结果。这实际上是一个马斯洛所说的“再圣化”的过程，它要求读者将已有的成见置于阅读行为之外，非直接性地面对文本，也即胡塞尔的“放弃现成的给定性”，回到事物本身。而这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

三、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在对文本学的解读模式进行了方法论上的理论梳理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更加具体而微观的话题中，即“回到马克思”所确立的新型解读视角，这就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中去重新探索他的哲学话语。

首先，从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研究全程看，自他1842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涉足经济学研究起，经济学内容就始终在他中后期的学术研究中占到了70%以上的主要地位，到晚年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1846年以后，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来说，纯粹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在独立的意义上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中认识到，经济学所面对的种种状况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那时，经济就是惟一的现实。所以，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对经济学的深入理解，也只有弄清这一主导性研究本身的真实历程，才能从根本上明白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线索的真实基础。

其次，从经济学语境中去探寻哲学思想内在脉络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解释构架中那种条块分割式的僵化理论边界。我认为，在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过分硬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真实进程中，他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现实批判（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始终没有分离的整体，各种理论研究相互之间是渗透和包容的关系。所以，我们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不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不行，哲学分析完全离开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也同样不行，这两种研究脱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目的更不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是一定要认真读懂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否则，将

不可避免地流于形而上学的轻浮。这也正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发性研究意图和全新视角所在。下面我将就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三个理论制高点的发现来谈谈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转向一般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转变始发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经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在《巴黎笔记》后期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达至最高点。这是马克思在历史研究和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接触的现实基础上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结果。从当时欧洲思想史整体状况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并非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在诸多背景因素(包括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青年恩格斯、赫斯和蒲鲁东基于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观点)制约下发生的逻辑认同。更重要的是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这一点恰恰是此时还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构架中的青年马克思拒绝和否定的方面。如果不能通过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参照系来确证,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则仍将是停留在“纯粹”哲学话语层面的名词释义罢了。那样,劳动异化史观被指认为唯物史观,人学被误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足为怪了。

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转变也即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它发生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即形成《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进程中,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始,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到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这一转变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科学批判基点的形成。我以为,除去社会主义实践和其他哲学观念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对古典经济学中斯密、李嘉图社会历史观的社会唯物主义的认同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超越,才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他也就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进行了“彻底决裂”之后,在经济学话语之上建立的新的哲学话语。这是一种全新的现实的历史话语。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三次重大转变仍然基于他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这个过程从《哲学的贫困》开始,经过《1850—1853年伦敦笔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基本完成。在我看来,这第三次转变并非异质性的思想革命,而是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即建立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之上的历史现象学的创立。其直接基础就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具有革命性突破的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1847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对以“资产阶级社会”为生产力发展最高点的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的批判考察。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实现的生产方式,他在完成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建构的同时,实现了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生产力最高水平为尺度的对人类社会及其个体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确证与批判。因此,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哲学探讨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获得了真正的实现。因为正是在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研究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才第一次得到了科学地说明,每一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运行规律也才第一次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在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被具体地指认。这也就是马克思创立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在“资产阶级”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分工和交换所形成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劳动关系(类)的客观外在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进一步的物役性颠倒关系(资本),因此也就历史地构筑了有史以来在社会生活方面最复杂的社会层面和内在结构,这必然形成独特的历史认识论的全新哲学基础。而批判性地去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拜物教,透过各种颠倒和物化的经济关系假象,最终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是马克思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历史现象学的主体内容了。

四、“历史现象学”的基本含义

那么，我用来指谓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的“历史现象学”，其真实内涵究竟是什么？与学界对上述研究方法的缄默态度不同的是，“历史现象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立刻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也包括我的老师孙伯鍨教授的批评。他们的疑问是：用“现象学”来指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成果，其合法性何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问。我以为，问题的关键是对“现象学”的历史界划。

自《逻辑研究》发表以来，现象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显学”广为人知。只要一看见这三个字，人们很容易将它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大师联系在一起。然而，必须声明的是，我使用这一概念的意义场，并不是来自胡塞尔的现代现象学，而是源于类似康德以后直至黑格尔所指称的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它是在传统本体论和传统认识论之中生发出来的。与胡塞尔主张的“意识现象学”不同，这种现象学并非要求人们以自我的内省或体验以及一种意识的精致微观结构去面向“事实”，达到一种先验本质的“澄明”境界，相反，它是从休谟的经验怀疑论开始，奠基于康德断裂开来的二元世界中的“现象界”，再经费希特、谢林的主体性努力，最终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中达成现象与本质的统一。黑格尔所创立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批判立场，它要求人们关注从具体地感知物相到构成感性确定性的“知觉”直至自我意识构架的分层现象结构，以及在现象背后作为最终本质和规律的绝对理念的揭示。这种古典意义上的“现象学”，是黑格尔在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研究事物（本质）在时间内的历史地呈现（显相）出来的认知科学。以黑格尔自己的话说，精神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的意识、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由最低阶段以至于最高阶段分析其矛盾发展的过程”^①。因此，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和导论中都说：“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就是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这是我借用这一概念的缘起性语境。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用“历史现象学”来指认自己的理论，这只是我在黑格尔古典现象学批判语境中的一种借喻。即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确认，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过程，必须经由对多重物化颠倒的商品—市场中介关系的历史性剥离，才有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非直接性的批判认知。这种历史性的批判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列宁所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一致的。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神正论的过程中，创立了批判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学现象学，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逻辑颠倒。而青年马克思在1845年最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赫斯的经济异化批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赫斯由于缺乏真正的哲学基础，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他的论述是不够鞭辟入里的。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虽然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还是隐性唯心史观的，他不得不为了革命的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但这也正是他自我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的出现，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它是一种在全新的逻辑建构中穿透资产阶级经济现象批判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

而在1845—1847年的哲学革命中，马克思在抛弃人本主义异化批判逻辑时，实际上已经在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实证科学的意味上否定了现象学认知（往往与异化逻辑相同）的合法性。可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对经济学资料的详尽占有过程中，他再一次在科学的视域中意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颠倒和物化的复杂性，所以，在超越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边界的同时，马克思重新创立了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不再是一般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而以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透视这种颠倒的假象，即如何去掉一层层现象和假象，达到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自然性（自在性）中客观发生的多重颠倒和客观异化，这才需要非直观和非现成的批判性现象学。这里，它不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面对的主观现象，也不是费尔巴哈和青年马克思自己原来那种否定现实经济现象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因为马克思这时的历史现象学的前提是社会关系的客观颠倒，这种颠倒的消除不可能在观念中实现，必须由物质变革来完成。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现象学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这种颠倒是如何历史形成的，它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以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秘密。具体地说，马克思必须面对复杂的物、物相、外在关系、颠倒了的关系、物化关系，非主导性的关系（如过去了的封建关系），在科学的历史抽象中找到原有的关系（简单关系），再一步步再现今天真实的复杂关系和颠倒了的社会结构。这不是直观或抽象的反映，而是一种重构式的反映。这里既要一步步破除社会关系中由于颠倒所产生的迷碍，获得史前的简单的社会关系，又要从这种抽象的关系一步步复归于颠倒的各种复杂的经济现象。这就使马克思进一步发现，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的资本、货币、价值、商品等，个人和一般人的常识眼睛是看不清它们的本质的，因为这是一种颠倒的歪曲的社会现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唯物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假象作为肯定性前提的。马克思这时关心的问题就是去掉意识形态，发现经济现实（物相）的本真性（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根本基点。也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正是他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传统的研究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所以，历史现象学是马克思《1857—1858 经济学手稿》的最重要的哲学成果，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理论制高点。

我以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可跨越的我们自己“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研究。在此，我想援引我的老师孙伯鍨教授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任何发展都好像是历史的延伸，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延伸。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充满了曲折和迂回，而且仿佛还有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要放弃已经卓有成效地获得的一切，而是要寻找新起点，以便向更高的目标推进。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在苦难和挫折中曲折发展时说道：‘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着和上述情境相同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最初文本’，这几乎是当今所有致力于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的共同意向。如果像上述马克思所生动描写的那样，不惜把事情重做一遍，以便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和事业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

向前进，这自然是十分正确而明智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原初作品，是为了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革命史和学说史的丰富经验（成功的和失败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借鉴马克思以后全世界历史发展的多方面丰富而生动的事实，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探索进而去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层面和精神内涵，以便使马克思的学说不仅成功地运用于破坏一个旧的世界秩序，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建设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不仅能成功地运用于革命和战争的旧时代，而且能成功地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新时代，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肩负起历史的重担，这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集中思考的大问题”^①。

〔本文责任编辑：孙 麾〕

马克思思想： 人之存在的文化精神

衣俊卿

马克思学说产生于 19 世纪，但它的意义却远未被 19 世纪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所穷尽。回首百年，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总是置身于 20 世纪重大理论争论和社会变革的焦点之中。能够不断同现代理论与实践展开对话与碰撞，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流派和新的实践模式，不断引发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争论，这本身就表明了马克思学说特有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而且，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特点来看，马克思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和意义也绝不会为 20 世纪人类的理论与实践所穷尽。萨特曾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②

因此，问题不在于讨论马克思学说是否有当代意义，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于如何合理地阐发马克思学说的现代意义，如何发挥马克思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对于马克思学说应当如何解读，是停留于具体结论还是深入本质精神？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表面看，在这一问题上人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没有分歧，实际上远非如此。

一、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深层结构的解读

虽然人们常常强调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要停留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但是，在现实中，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中国的国情中，这一问题的解决尤其困难。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在行动上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而在理论上则倾向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发现，无论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是在社

① 参见孙伯鍈为拙作《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所作的序，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会主义建设中,固守马克思主义现成结论的教条主义都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这种以“坚持”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左”的倾向还往往被冠以“革命”的称号,因此,更容易被人们原谅和认可。“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在理论界和政治界都常常导致机械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而忽视或偏离其精神实质的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和倾向使我们的哲学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答案的理论研究方式。而这种停留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的研究方式又常常使人们从不同的著作和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结论。

显而易见,要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实质,就要从表面结论深入到深层的理论逻辑,而为了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理论逻辑,我们首先要对马克思学说做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和定位。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学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库。人们习惯于把马克思学说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理论讨论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又逐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史学理论、法学理论等。这些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它们只是人们对马克思学说阐发和应用的结果,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

具体说来,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的确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理论等领域,但是,马克思从事理论研究的宗旨不是纯理论性的,他本人并未试图建立传统分类学意义上的具体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理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的各种理论探索称之为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等。马克思从事这些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某种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去取代传统的理论体系,而是要根本超越建立在传统分工基础之上的、以“解释世界”为特征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形成一种实践性的、批判性的理论精神,其宗旨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所有的理论批判和理论研究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而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体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这种一体化的学说从总体上属于哲学,但它不是由给定的理论范畴和命题构成的抽象的哲学理论体系,而是一种立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活动,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这应当是本真意义上的哲学。

如果我们忽略了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一体化特征和实践性本质,按照传统分类学把它划分为几种具体的理论,就会割裂或遮蔽了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把它变成具体的、替现状辩护的非批判的实证性理论。这种做法本身就加剧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例如,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就是这种把马克思学说“实证化”的理论恶果。因此,要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深层本质精神,必须从马克思的各种理论批判所形成的一体化的实践理论和批判理论这一本质特征和基本定位出发。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虽然不能接受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认识论断裂”的结论,但的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借用他的结构主义的本文解读法,即“依据症候的阅读法”,对马克思学说作出共时性的和历时性的双重结构分析。

1. 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依据历史尺度和抽象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由表及里,把马克思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观点粗略地划分为三个基本的层面。(1)构成马克思思想表层的是关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分析结论、关于具体历史进程的预见、具体的革命措施、实践设想等具有操作性的实践理论结论。在马克思学说中,这一类论述是大量的,其中包括马克思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关于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特定策略的设想;关于西方议会制、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具体的经济范畴、经济危机、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关于特定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思想家的理论观点的分析和

批判,等等。(2)构成马克思思想中层结构的主要是以经典唯物史观为表述形态的社会历史理论。其中,主要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的设计,特别是关于社会变革的内在规律和机制的探索,具体表现在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本内涵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人类历史模式的设计。(3)构成马克思思想深层结构的是关于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论,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关于实践哲学的构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以及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论设想。

2. 历时性的结构分析。我们很难把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区分为几个界限分明的阶段,以及相应的明确的理论或思想转折。但是,从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来看,他的思想历程有一个基本的走向,大体上与我们上述揭示的马克思思想的结构层次有一种特殊的、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移动的对对应关系,即从关于人的生存结构和人的发展的哲学反思,经过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到具体的实践性理论的设计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从写博士论文到1845年前后,马克思的关注中心聚焦于人的生存结构、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解放与发展。关于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性的强调、关于人的对象化实践本质的阐发、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关于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设想等,从不同层面建构起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深刻的哲学理解。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前后,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批判等,把关于人的存在的哲学理解转换成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关于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变革模式的社会历史理论,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涵的经典唯物史观。而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揭示、关于原始社会的研究、关于东方社会结构的分析等等,其目的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的理解和社会历史理论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性理论。在这一思想历程中,早期的思想和理论内容逐渐积淀在他的学说和理论的底层,成为他的思想的深层结构和隐性理论。

3. 关于马克思思想层次结构的价值学分析。现在,当我们把上述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共时性结构分析和历时性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加以总体把握时,我们马上就遇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评价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层次结构?尤其重要的是,如何评价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即他早期关于人和实践的哲学理解?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问题,尤其关系到如何揭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的大问题。实际上,过去一百多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争论都与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常见的观点是只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前两个层次,即各种表层的具体结论和中层的社会历史理论,而否定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即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构想,这种观点有时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否定而表现出来。一个特殊的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倾向。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问世后的大半个世纪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他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三本最能代表马克思关于人和实践的基本理解的著作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在这种背景中,否定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倾向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干脆忽略马克思的哲学见解,把他的学说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的学说视作早期不成熟的观点,断言后来成熟的马克思抛弃和批判了早期的观点;三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断言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中(1845年前后)经历了一个“认识论断裂”,此后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否定了早期以人